



从“西政”到新“世界学” “西学??”与政治学中国本土?系的初建

著者	? 青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 = Journal of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Studies
volume	2
page range	381-401
year	2009-03-31
その他のタイトル	The Creation of an Indigenous Genealogy: for the Discipline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Modern China
URL	http://hdl.handle.net/10112/3248

从“西政”到新“世界学”

——“西学东渐”与政治学中国本土谱系的初建

孙 青

The Creation of an Indigenous Genealogy: for the Discipline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Modern China

SUN Qing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modern China was the result of a complex process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The arrival of Western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related academic theories in late-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led to heated debates among Chinese scholars. Did political science exist as an indigenous tradition of knowledge? Some authors asserted not only that a discipline similar to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had existed in China but that it even possessed its specific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a unique set of classical works and authors. Among of the legacy of this reshaping of political science's disciplinary history are courses entitled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or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which are taught at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s in many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intellectuals involved in the reinven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had different academic backgrounds and advocated conflicting political positions. Still, they all helped to bring Chinese native knowledge into dialogue with the Western discipline of political science. Starting point of this paper is the question of the narrative requirements of the discipline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 will then analyze different attempts to reshape the Chinese tradition in view of Western concepts and the ways in which indigenous contents was analyzed by applying a Western disciplinary methodology. Finally, I will discuss the “disciplinary classics” on which such interpretations were based.

キーワード：西学东渐、学科史、政治学史、传统的再发明

政治学作为分科知识在现代中国的兴起是东西文化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

有的学者在讨论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时曾发现，相当多的近代中国学人在面对西方社会科学时，具有将西方观念视为人类普遍准则的倾向，并试图将本土内容同化于这些准则之下。¹⁾这一点在“西政东渐”

1) 罗志田：《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107页。

的场景之下，的确表现得颇为明显。从二十世纪初被时人目为“言西学之第一人”的严复，到中国当代政治学研究者，他们都曾从西方政治之学的立场出发，以此为准则来考问中国传统——“在中国的传统中是否存在政治学”。严复得出的结论是，以“科学正法眼藏”来看，中国古人所谈的大抵可称为“设事而知方”的“术”，而不足称为“即物穷理”的“学”。²⁾而当代政治学研究者则更明确地表示，在中国的传统中缺乏“将有关政治的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思想和文化基础”。³⁾

实际上自“西政东渐”以来，围绕“中国传统中是否有政治学”的热烈讨论，就始终没有停息过。曾经有人断言，中国的传统中不但也有类似西方“政治学”的知识门类，而且本土政治学还有自己清晰的叙事结构、经典体系和人物渊源。在晚清学术转型的场景下，这种对“政治学”本土历史记忆的重塑，其影响绵延至今。从大学政治系中例如“中国政治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这类必修课程中，我们就可以发现此类痕迹。晚清参与“中国传统中是否有政治学”讨论的人们，出于彼此相异的动机，有着形形色色的背景和立场。唯一的共通点是，他们一起将中国本土知识传统卷入到与“西政”的广泛对话中来。下文将以十九世纪中期以来“西政”带来的学科叙事需求，作为考察的起点，描述背景各异的人们是如何以“西政”的眼光来重新梳理传统，并试图将本土内容纳入“西政”分析视野之下的。源于西方的“政治学”的本土学科谱系，正是据此被塑造出来的。

我们将发现，晚清以来进入国人视野的“西政”，及西方人关于政治的理性化思考与中国本土知识传统不断地发生着互动。“政治学”作为一种现代知识样式，其在中国本土的建立无疑植基于此。

一 “西政”的叙述需求

“西政东渐”首先遇到的是表述层面的问题，即如何在本土语境中叙述异质的英美民主政治制度。1819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巴达维亚（Batavia，即今之雅加达）编辑出版了一本供小学生使用的简明教科书《地理便童略传》，用问答的形式普及一些有关西方的地理常识。此书在《论亚默利加》这段问答中，涉及对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介绍，就表现出某种陈述上的困窘：

六十九问：“花旗国之**朝廷**如何？”

答：“花旗国之**朝廷**，略像英吉利国之朝廷，都有两大会，致力法律、粮税等事，惟花旗国无王，只有一人称总理者治理国家的事，其在任四年，然后他人**得位**”。⁴⁾

这段问答一面称“花旗国无王”，一面又使用“朝廷”、“得位”这样的概念来叙述英美政治，看来多少有些滑稽。这实则已然显露了“西政”东渐中的上述基本困扰。有关晚清以来“东渐”之西学，对传统资源的借用问题，已经得到学术界广泛的关注与讨论。⁵⁾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西政东渐”情况底下。“西

2) 严复：《政治学讲义·第一会》，见严复著，王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五册，第1248页。

3) 林尚立：《为中国政治学寻求学术支撑》，《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4) 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编：《地理便童略传》，巴达维亚，1819年出版，转引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晴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116页。

5) 参见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载氏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

政东渐”解决表述问题的首选办法同样也是：从传统资源中找到有关“西政”之基本的“国家最高权力”、“政府”之类范畴的表述方式。1838年裨治文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在新加坡出版。此书经过1846年在广州，1862年在上海的两次修订重版后，易名《大美联邦志略》。有学者认为此乃鸦片战争前最早系统介绍美国史地的中文著作。⁶⁾对于稍后梁廷枏的《合省国说》，魏源的《海国图志》美国部分，徐继畲的《瀛寰志略》而言，此书都是最重要的参考资料。⁷⁾《大美联邦志略》作为华人了解美国的最初窗口，它在向中国介绍美国民主政治制度时，就试图从中国传统资源中找到解决表述问题的方法：

夫我联邦之政法皆民立，权不上操，其法之已立者，则著为定例，上下同遵……公同议定开创政体，以为新国，世守成规，所有七条，俱列于左：……（第三条）一凡行法权柄，总归**国君主持，位分正副**，率任四年（副君无职守，除**国君**有病或病故，**副君**代摄外，余无权。不过为元老之领首而已）。是**二君者**，概由各邦会中公举，其选举之制，按**旧君**满任，选期将届……誓云：予小子输诚昭告，而今而后，**君临联邦，恪供要职**，原创政典，敬守勿失……至于军务大权，不分邦国，凡水路之兵将，概归**国君**节制……

……按乾隆五十四年，**联邦始立君**，其首**践位**者为华盛顿……⁸⁾

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首个以华文行世的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道光丁酉年（1837年）11月号的《北亚米利加合郡》一文内，这样谈及美国政治制度：

此民自主治国，每三年一次选首领主，以总摄政事。今年有一位称元比林，**继承大统**，盖其为历年**勋旧之臣**……⁹⁾

在道光戊戌年七月（1838年）的一则新闻《北亚默利加办国政公会》中，也有这类表述：

……故不立王以为国主，而**遴选统领副统领等大职，连四年，永承大统，必干民之誉，了然知宰世取物，发政施仁也**。……¹⁰⁾

我们发现，传教士在向华人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之时，从中国本土传统中借用“国君”、“践位”、“君临”、“继承大统”这类字眼来表述英美民主政治中的“国家最高权力”，同时又对其采用“恪供要职”、“历年勋

340-50页，以及 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指示、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2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54页。

6)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117页。

7)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117页。

8) 裨治文：《联邦志略》，见王西清、卢梯青编：《西学大成·卯编史学》，上海：醉六堂书坊 清光绪21年（1895），石印本，12册。

9) 爱汉者（郭实腊）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97页。

10) 爱汉者（郭实腊）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89页。

旧之臣”这样的描述。君耶？臣耶？本土传统在这一新的表述需求面前，显得异常窘迫。如果坚持本土传统的“君”、“臣”对立格局，则美国的政治制度看来非但君臣难分，而且为臣者似乎也可以为君，为君者可以易姓更替，似乎为君者也只是供职而已，而非“奉天承运”，这显然很难为当时的中国人所理解与接受。

1856年，慕维廉在译介《大英国志》时，开始采用“恩伯腊”（emperor）、“京”（king）、“伯勒西顿”（president）这类音译方式，努力区分异质政治制度下的“国家最高权力”，这表明已有人在寻求新的叙述办法了，进而言之也最先把世界分为三种国体介绍到中国来：

天下万国，政分三等：礼乐征伐自王者出，法令政刑治贱不治贵，有国者西语曰**恩伯腊**（译即中国皇帝之号），如中国、俄罗斯及法兰西等国是也；以王者与民所选择之人共为政，君民皆受治于法律之下，有国者西语曰**京**（即王，与皇帝有别），泰西诸国皆有之，而英则历代相承，俱从此号；又有无帝王，以百姓推立之一人主之，限以年数，新旧相代，西语曰**伯勒西顿**（译即为首者之称），如今之合众部是也。¹¹⁾

“西政”东渐最初，人们在向传统寻求类似的概念范畴，以便描述外来的政治制度时，也开始不自觉地以“西政”的眼光重新打量中国传统。比如把中国的“国家权力形式”放到“世界”的背景下去分析，并将其划归于与法国、俄罗斯为一类。在此基础上，判断中国皇帝即等同于西方的“恩伯腊”。这种谈论问题的方式在“西政”入介之前是不会发生的。很明显，中国传统中“王”与“皇帝”的区别并不在于权力来源是否基于“法律”，是否“与民所选择之人共为政”（是否与民分权），而是在于权力的范围和等级具有广狭高下之别。而“西政东渐”在向传统借用资源的时候，却悄然地赋予了传统范畴以一些新的内涵。虽然，在“西政东渐”早期，即传教士著述阶段，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还远非出于学科立场的主观行为。但就事实而言，日后属于“政治学”学科特有的一些讨论方式，在“西政”进入本土伊始就已经出现，并开始被用于对本土传统的分析之上了。

二 学科分析范畴在本土的初建及其对传统的重新解读

“西政”与本土传统进行对话之初，除了欲解决表述层面的问题以外，还表现出第二个明显的倾向：就是欲建立一种分析政治行为的统一模式，以期将中西异质政治制度同时纳入其中，进行比较分析和评价。历史的复杂性在于，除了“西政东渐”的主动方——西方传教士以外，中国本土知识分子也参与了这一对于“政治学”在中国之建立而言十分重要的环节。

晚清传教士译介西方史地及政治制度，乃着眼于向华人展示西方文明，以期证明西方不仅不是“蛮夷之地”，而且还有比中国更为优秀的文化。如郭实腊曾经明言，《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刊宗旨是：

鉴于中国人仍然妄自尊大，固步自封，视异族为“蛮夷”，需要谨慎巧妙地展示西方的文明，使中国人认识到洋人不是“蛮夷”，并且知有不足，愿向西方学习，裨以维护在华洋人的利益，发展他们与中国

11) 慕维廉翻译：《大英国志·凡例》，上海：墨海书馆1856年出版。原书为英国学者托马斯·米纳尔所著 译本经寓居上海的宝山人蒋敦复润色，第1页。

人的交往。¹²⁾

又如1879年至1883年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将其连载于《万国公报》的文章单独结集，以《自西徂东》为中文书名出版，其英文书名为 *Civilization, China and Christian*，意即在通过比较中西方文明，指出中国社会、道德、文化落后于西方之处，并提出改进办法，实现其传教的目的。

无疑“西政东渐”早期之欲建立一种特别的分析模式，并将中西政治统摄其下进行叙述与评价，与传教士们的上述主观意愿极有关联。但若着眼于“政治学学科在中国建立”的问题来考虑的话，普遍性分析范畴的构筑，显然同时也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环。“政治学”作为分析人类社会政治活动的学科门类，在日后的中国是以一种普适的面目出现的：它应当既能解释西方国家的政治活动，也能对本土的相关内容做出分析。1902年创刊于沪上的《新世界学报》在其相当于发刊词的“序例”中，典型地表露了这种对“新学”普适性的强调：

本报名《新世界学报》，犹言‘新学报’，取学界中言之新者为主义。‘世界学’连读，‘新’字断，与‘世界’不连读¹³⁾。

显然该刊是欲按所谓“世界学”，即当时西方日趋制度化的学科分类样式来“通古今中外学术”的。“政治学”作为《新世界学报》的常设栏目，此时早已被摘去了“西政”之“西”的帽子。人们期望它同样能为中国本土政治内容提供解释。“政治学”既然被视为普适性的“世界学”之一，一旦面对中西异质文明下不同的政治内容，就必须找到某种统一的模式和范畴来加以处理。

在十九世纪早期，“西政东渐”的最初阶段这种对统一分析范畴的寻求就已经发生了。那时候，人们开始重新讨论“礼乐征伐”出自不同阶层的政治制度间的优劣，也开始逐渐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形成“君主制”、“封建专制”之类的判断。东渐的“西政”除了将一些传统命题转换为“政治学”的统一分析范畴之外，同时也试图将传统纳入其中进行分析。

慕维廉在前引《大英国志·凡例》中，曾借用孔子“礼乐征伐自何者出”的命题，将天下万国之政分为三等，中国在其中自然属于“礼乐征伐自王者出”者。所不同的是，儒家传统中这一判断天下是否“有道”的标准，此处仅被视为分析世界各国国体的手段，而不再着眼于孔子所强调的道德意义。其后本土精英有关君主之国、君主立宪之国、民主之国的讨论恐怕可以追溯至此。

类似的分析，更早地已经出现在1838年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他从权力来源角度讨论中西政治制度的异同，其欲寻找某种统一的分析范畴，此处已表现得颇为充分：

夫宇内之国政，大要不同者有三，一曰权由上出惟君自尊，如中华安南土耳其等国是也。一曰君民同权，相商而治，如英法等国是也。一曰君非世及，惟民所选，权在庶民，君供其职，如我联邦国是也。¹⁴⁾

12) 郭实腊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导言》，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6月，第12页。

13) 《序例》，《新世界学报》，光绪壬寅（1902年）第1期，总第1号。

14) 裨治文：《联邦志略》，见王西清、卢梯青编：《西学大成·卯编史学》，上海：醉六堂书坊 清光绪21年（1895）石

又如，花之安在《自西徂东》的《明正道权》一章中，阐发中国传统的“道”、“权”之分，将中西政治制度纳入这一分析范畴中加以论述。泰西在这个标准下看来，是行王道而不揽权的，而中国秦始皇分邦建国以后的君主们则恰恰相反：

天下有大公之道，即有独伸之权，道与权固相需为用者也。圣王以道治民，即以权御世，降及霸者，犹存此风。然而以权窃道，其权悉属偏私，曷若以道济权，其权悉归至当……夫封建是圣王大公无我之道也，而霸者漫欲以智力牢笼宇宙，以权术驾驭臣民……间尝论之，**中国之君，其权最重，操生杀黜陟之柄，主荣辱富贵之阶……（英国）夫君主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所欲行之政事，先着阁部臣工与之商酌，将行，又有枢密院大臣金名，若枢密院不金名，其事仍不能行。……**至美国之皇则为众民公举，数年则退位，而国政亦美，此刻见国君之不揽权也。**¹⁵⁾

显然，传教士们试图借用儒家传统命题，希望仍旧在“礼乐征伐从何者出”的层面，去分析天下万国不同政治制度间的差异（就今天的政治学概念而言，就是“国体”的差异），并做出与孔子截然相反的价值判断。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实际上也已经把传统儒家范畴转换成了现代政治学的学科命题。除此之外，他们还将“儒教”定位成世界上“治国之道的三大端”之一，并为基督教、回教及“儒教”一一划分了各自的统治区域和人数。据他计算，“儒教”辖地“四十兆方里”，治民“四百余兆”¹⁶⁾

康梁维新派知识分子为了论证其变革的合法性而借用传统，这已经是学界的共识了。实际上，源于“西政”的“政治学”学科视野的建构，与戊戌前后维新派知识分子的上述努力正有着密切的联系。

1896年，梁启超首先把康有为的“春秋三世说”与西方现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从政体角度讨论了中国古代社会：

博矣哉，《春秋》张三世之义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阙之。¹⁷⁾

1899年，梁启超又开始从“国体”角度来讨论中国与欧洲的异同之处。¹⁸⁾当然在梁当时的语汇中，“国

印本，12册。

15) 花之安 (Ernest Faber): 《自西徂东·卷四智集·第二十七章明正道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16) “一知今日治国之道仅有三大端，泰西各国救世教一也，中国儒教二也，土耳其等国回教三也……受治于儒教者四百余兆，……儒教所辖者四十兆方里……”（英）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序，见（英）麦肯齐著，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口译，蔡尔康笔录：《泰西新史揽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页。

17) 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见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7页。

18) 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1899），见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61-66页。

体”与“政体”经常混用，都是指国家的权力分配方式，两者还没有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严格概念区分。他认为，中国与欧洲一样，在远古时期经历了家族和酋长时代：

穹古之史，虽不可尽信，然推原人类之所由起，与邦国之所由成立，无东无西，其揆一也……董氏所谓九皇六十四氏者，皆以家族为国者也。……

梁启超认为传说中夏、殷两朝虽属帝政，但按照现代政治学的眼光来看，两朝的君主只不过是酋长们的盟主。¹⁹⁾

梁还认为，从“国体”角度看，中国的周代和欧洲的希腊非常相似，属于封建时代和贵族政治，²⁰⁾而春秋战国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国与欧洲的国体开始有了区别：

欧洲自罗马以后仍为列国，中国自两汉以后永为一统。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故中国可谓之无贵族之国，其民可谓之无阶级之民。²¹⁾

“国体”是典型的政治学范畴，梁启超参照西方政治制度史的叙述结构系统地重新描述了中国古代社会。虽然许多具体内容仍是老生常谈，但叙事方式的变革却发生了。

正如学者所论，中国人的合法性论证策略于二十世纪之初，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²²⁾尧舜对于讨论现行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仍然具有相当的典范意义。于是，“尧舜禅让是否属于民主”，也相应地成了维新派需要澄清的问题。1901年，梁启超作《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在这里，梁启超触及了另一个典型的政治学范畴，以“中央政府控制能力”来分析问题。他认为，尧舜禅让与民主政治无涉，乃中央集权不够的表现。不仅如此，他还接着从这个分析范畴出发，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社会。梁启超从政治学角度断言，尧舜禅让制到大禹世袭制的转变，实际上并非道德日趋堕落，而是由于禹时中央控制能力日渐加强使然：

要而论之，则中国之政体，自黄帝以前，君主无世袭权，大禹以后，君主有世袭权，而自黄帝至大禹

19) 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1899），见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61-66页。“其第一期最有力者，则共工氏霸有九州，次有蚩尤氏与轩辕战于阪泉之野。其第二期民众而悍者，则有苗氏皆土著之民。其第三期则黄帝之子孙，入冀豫之地而夺之，卒迁三苗，享有其地。后此所谓三代者，皆轩辕（黄帝）之后也。……此其进行之轨度，与欧洲毫无所异。夏殷之间，虽云帝政，其实则各种族之酋长，相与并立，……夏殷不过诸酋长之盟主耳。……”

20) 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1899），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1-66页。其文曰：“周之一代，纯为贵族政治。在周则有周召单刘，在齐则有国高，在鲁则有三桓，在郑则有七穆，在晋则有栾郤胥原范荀，在楚则有昭屈景，皆相继持一国之大权。欧洲人所谓少数共和政体，谓之寡人政体是也。其政府（即贵族）之权力甚重，过于国君。国君之废立，出于其手。国君之行为能掣其肘。如周厉王无道，国人流之于彘；而共和执政，滕文公欲行三年之丧，而父兄百官皆不欲之类是也。以希腊诸国比例之，大约近于斯巴达之政体最多。”

21) 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1899），见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61-66页。

22) 章清：《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系谱的建构》，见（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第10期

之间，则世袭权定而不定之过渡时代也。……此过渡时代，前后实亘四百余年，至禹而始定，若是者谓之豪族帝政，此种政体，在他邦亦往往有之……由此以观，可知黄帝、尧、舜时之君权，绝非如后世帝者之强盛。其主权大半在豪族之手，若帝者之意见与豪族相冲突时，决不能也。

由此观之，则传贤传子之变迁，实由政体之进化使然。非至于禹而德衰，实至于禹而力盛也。

梁启超从一些典型的政治学分析范畴出发讨论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传达了这样的信息：西来政治学此时已经试图以一种“正法眼藏”的姿态，对中国传统进行所谓的“学理”收拾了。²³⁾这也表现在严格按政治学学科命题来规范对中国古史的叙述方式上。

1902年，梁启超在讨论中国专制政治发展史的时候，列举了五种“泰西”关于“政体”的分类方法，一一列表，并将中国古代历史分别对号入座。²⁴⁾根据分别出自希腊大哲亚里士多德，十八世纪法国大哲孟德斯鸠，近儒奥斯陈，日本博士一木喜德郎以及法国博士喇京《政治学》的五种政体分类法，梁氏最后得出结论：

综以上五表论之，则我国所曾有着，第一表之第一（君主政体变体）第二（贵族政体变体）两种也，第二表之第一（君主）第三（贵族）第四（专制）三种也，第三表之第一（一人政体）第二（寡人政体）两种也，第四表之第一种（专制独任君主政体）也，第五表之第一（族制政体）第二（神权政体）第四（封建政体）第五（近世专制君主政体）四种也。²⁵⁾

梁启超承认，由于中国人的“脑识”之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政体区分概念，因此如果要讲清楚中国的政体变迁，必须从叙述西方政治制度史开始，通过不断的比较得出结论。而制度化的西方政治之学中业已成熟的一些术语概念、讨论模式，正是通过这类比较和示范，参与到人们对本土传统的叙述中来的。

除了讨论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以外，源于“西政”的“政治学”，也参与到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新描述中来。

1901年，梁启超依照德国国家学大家伯伦知理在所著《国家论》中讨论欧洲中世及近世思想史的方式，列表比较，讨论中国传统中的有关思想。该表分国家的主体、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阶级、帝王与天的关系，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公共教育、立法权之所出、公法私法及人民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是否平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中央的控制力，等等十一个方面，左列欧洲旧思想、中列中国旧思想，右列欧洲新思想，依次比较。不仅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划出了属于“政治思想”的部分，还依据上述政治学考察社会的十一个方面，对其做了更为细致的分疏和再定义：

23) 严复：《政治讲义》，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24) 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1902），见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59-82页。

25) 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1902），见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59-82页。

中国旧思想：一、国家及人民，皆为君主而立者也，故君主为国家之主体。二、国家与人民，全然分离，国家者、死物也，私物也。可以一人独有之，其得之也，以强权以优先权，故人民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无关。三、治人者为一级，治于人者为一级，其级非永定者，从皆可以为治人者，但既为治人者，即失治于人者之地位，既为治于人者，即失治人者之地位。四、帝王非天之代理者，而天之所委任者，故帝王对于天而负责任。五、宗教为政治之附属物 六、无公共教育 七、立法权在一人（君主），其法以古昔为标准（或据先哲之言，或沿前朝之制，或仍旧社会之习惯）八、无公法私法之别，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而无义务，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而无权利 九、惟君主一人立于法律之外，其余皆受制于法律，一切平等 十、政权外观似统一，而国中实分无量数之小团体，或以地分，或以血统分，或以职业分，中央政权，谓之弱小也不可谓之强大也亦不可 十一、庞大一统，政治之区域辽阔，且无贵族阶级，故政府虽非能予民以自由，而因其统治力之薄弱，人民常意外得无限之自由。（亦意外得无限之不自由）²⁶⁾

更为有意思的是，梁氏并不满足于依照伯伦知理《国家学》的方式来叙述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他还进一步引用《孟子》来讨论世界范围内国家思想的变迁：

今试演孟子之言，以证明国家思想之变迁如下：

十八世纪以前	君为贵	社稷次之	民为轻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	社稷为贵	民次之	君为轻

梁氏以《孟子》的概念范畴来论证西方政治学的命题，实际上已经把传统经典《孟子》转换成了政治学经典。《孟子》就这样通过概念语境转换，成了新塑造的中国现代政治学的理论资源。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并不是当时唯一以“政治学”范畴来讨论本土内容者。例如，1906年严复在上海青年会演说西国政治学，他在解释神权政府的时候，就对传统做过这样的假设，如果东汉张角、张鲁成事，他们的政府就是典型的神权政府²⁷⁾。又如，他在1904年为甄克斯《社会通论》所作的按语中也曾以“政治学”的范畴来分析中国历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²⁸⁾

自十九世纪初“西政东渐”伊始，传教士们就试图以“礼乐征伐从何者出”，或“道、权”概念，及能将“当今之世”一分为三的“治道”这类分析范畴，来统一叙述中西异质文明下的政治内容，比较其优劣高下。同时也将本土的一些传统范畴转换为政治学学科的命题。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某种普适性的政治学学科视野、分析范畴、叙事结构，已经在中国本土成熟起来。维新派们借之以重述传统，以取得对变法合法性的证明。被誉为“言西学第一人”的严复，在讨论传统之时也视这种学科叙事方式为“科学的正法眼藏”。可以说，“西政东渐”抑或“政治学”在本土建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此时已基本成型了。

26)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见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12-22页。

27) 严复：《政治讲义》，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8) 甄克斯著，严复译：《社会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33页。

三 追溯本土的“政学”传统

“西政”东渐的成果之一，是在本土建立某种普适性的“政治学”。这门学科既然被视为“世界学”之一，人们就寄望它能为中西政治同时提供解释，并借此开拓出一条国家出路，以此作为构建理想国度的理论依据。与此同时，本土学术在这一来源于外部的新知识形式面前，便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某种文化紧张感。本土为了应对这种紧张，便牵扯出“西政”东渐中另一个关键性的环节：如何溯源寻找本土的“政治学”传统。

1903年申报馆主笔雷绍编的《中外策问大观》，是为了应对清末科举改试策论而编的一部策艺大全，其收录的策问反映了时人关注西学的一些具体面向。在“治道”中有一条策问，便体现了上述本土对西学、西政的文化紧张感：

问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近日士大夫震于泰西富强之术或欲舍所学而从之。其会通为两可之说者，又援引比附，欲合中西为一，非是则非矫激为迂拘，岂圣人礼教之防有时而穷欤？抑所见有不如后人之广大欤？盖以所见言之²⁹⁾

士子何应璜对该策问的回答是：

圣人治天下，有道亦有术。道者，百世而不变。术者，因时而制宜。何谓道，纲常伦纪是也。何谓术，兵商二者是也。是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自古至今，未能或异，而忠变为质，质变为文。虽三代不能免。³⁰⁾

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化之初，曾经用“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说”或上引“中道西术论”来缓解这种文化上的紧张。要么将“西政”视为“我之叙余”，要么将它圈定在“术”的范围，而取消其解释社会政治行为的合法性。学术界对这个过程早已有了相当清晰的研究。³¹⁾直至20世纪初《新世界学报》阶段，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文化紧张感也并未稍减。

自《新世界学报》第二期开始，杜士珍在“政治学”栏目内，连载发表了《论秦后政治家派》，旨在按“政治思想”来“条分学派”品评传统人物。杜氏在这篇可以视之为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雏形的文章中，坦陈了自己这样做的目的：

……于此角彼特之场，欧美大政治家，煌煌垂简册，五洲奉为美谈。然天下非无健者，我安得起我四千年通人巨子与上下其议论，集其精液以灌输我四万万同胞之神经中，俾渐磨鼓厉久而自奋。……故于

29) 雷绍辑：《中外策问大观》，砚耕山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石印本。

30) 雷绍辑：《中外策问大观》，砚耕山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石印本。

31) 全汉昇：《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见《岭南学报》1935年第四卷第一期。

秦汉来政治家条分其学派之区别，以表明夫进退消长之故。³²⁾

高步云在学报1903（光绪癸卯）年第一期《论周末诸大家学派与中国历史之关系》中也表露出类似的想法：

今世界上所称的哲学家轰轰烈烈足以增历史之荣誉，而学风变动有一国历史相关系者，不曰法之卢梭必曰英之达尔文，不曰德之康德必曰英之斯宾塞尔，我中国阒无闻焉。呜呼，吾中史其无色矣，吾中史其无色矣，虽然，孔子者，吾中国之大政治大哲学家也。

显然，《新世界学报》在处理中西政学关系的时候，将“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等进化论观点引入了学术领域。在该刊的主要撰稿人看来，自本土学术传统中寻找足以与西学抗衡的内容，不仅是应对外来学术压力的手段，同时也是“学术救国”的重要途径。

本土文化在日益具有普适性权威解释力的“西学”面前，表现出持久的紧张感，而唯一的缓解之道就只有：在传统中溯源，重塑关于本土“政治学”的历史记忆。

早期的“西学中源说”立场，就着手追溯过本土“政学”的传统：

陈炽在《盛世危言·序》中认为：

倚商立国，《洪范》八政之遗也；籍民为兵，《管子》连乡之制也；议员得‘庶人在官’之意；书院有‘书升论秀’之风；罪人罚缓，实始《吕刑》；公法睦邻，犹秉《周礼》……和约使臣，乃历聘会盟之已事；用人则乡举而里选。

而在康门弟子梁启超、徐仁铸等人看来，中西政学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各有源头却又结构相似的。光绪丁酉年（1897），梁启超入主湖南时务学堂，任中文总教习，开始“以六经并入西学”。³³⁾当时，另一位南海门人宛平徐仁铸也出任湖南学政，同时“手颁条诫，分谕各学”，作《轺轩今语》与梁启超相呼应。

徐是反对“西学中源论”的，他在《轺轩今语》中说：

近人于西学一门，考据颇详，西政则中国尚少讲者。曩者华人震惊西学，以为绝技，谓震旦之人所不能至，固属自弃。近人有牵合比附，谓西人之学悉出中土者，亦涉自大之习，致为无谓。”

又说：

要之，陆子静所谓‘四海各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此所以东西虽辽绝，而政学之暗符者，不一而足也。

32) 杜士珍：《论秦后政治家派》，见《新世界学报》壬寅第二期 政治学 1902年9月16日。

33) 叶德辉：《叶吏部〈轺轩今语〉评》，见《翼教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70页。

西方人因为能够将发源于希腊罗马的传统发扬光大，所以成就了今日的富强：“西人艺术原本希腊，政学原出罗马，惟能继续而发明之，遂成富强。”相较而言，“我中土则以六经、诸子之学，而数千年来暗昧不彰，遂以积弱，学者不可不自奋也。”

梁启超与徐仁铸看法相似。他在1896年的《变法通议》和1897年的《〈西政丛书〉序》中，都有类似的表述：

“故夫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征之域外则如彼，考之前古则如此，而议者犹曰彝也彝也，而弃之，必举吾所固有之物，不自有之，而甘心以让诸人，又何取耶？”

“政无所谓中西也……此古今中外之所同，有国者之通义也。”

1897年梁启超编《西政丛书》时，从公法、官制、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学校、律例、兵政这些角度来讨论“政”，并认为这些内容是中西统一的：“此古今中外之所同，有国者之通义也”。而此前即1896年，梁氏已经在《变法通议》一文中，从上述“西政”分类出发，去追随溯中国传统中的“政”了：

《周礼》、《王制》，非西书也。八岁入小学，十五就大学，升造爵官，皆俟学成，庠序学校，非西名也。谋及庶人，国疑则询，国迁则询，议郎博士，非西官也（汉制博士与议郎大夫同主议论，国有大事，则承问，即今西人议院之意）。……三老嗇夫，由民自推，辟署功曹，不用他郡，乡亭之官，非西秩也，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商约之文，非西史也。交邻有道，不辱君命，绝域之使，非西政也。……故夫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征之域外则如彼，考之前古则如此。

很明显，徐仁铸、梁启超等人在讨论中西政学关系的时候认为，中西学术的两个源头在结构上是相似的，其区别仅在于，属于中国的那个源头“数千年来暗昧不彰”而已。于是，从六经、诸子之学中去寻找类似西方政治之学的源头，就成了一条顺理成章的通向“富强”之路了。这一“溯源”工作背后的理论预设已然十分清晰，那就是中国传统学术中，也存在类似“西方政治之学”的分科知识结构。

唐才常则从处于传统边缘地位的子学中去寻找本土“政学”的源头。他明确声称西国律例家就是古代的法家，西国公法家就是古代的名家：“若夫西国律例家，即古之法家。《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盖据乱世之律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盖太平世之律例……西国公法家，即古之名家。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为刑书，也为正名之书。”³⁴⁾

张灏先生曾经指出古典非正统哲学（即所谓的“诸子学”）的复兴，是19世纪末叶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³⁵⁾这一趋势与西方社会科学本土化过程存在着互相影响的关系，于此处也可见一斑。唐才常沟通中西的理论，无疑与中国本土学问的自身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春秋三世说”居于唐氏理

34) 唐才常：《治新学先读古子书说》，见郑大华，任菁选注，《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砭旧危言——唐才常 宋恕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

35) 张灏著，高力克、王跃译：《危机中的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1章。

论的核心地位，虽然外来的进化论思想对它不无影响，但它同时也是今文经学自身发展到19世纪末的一个重要结果。

1903年雷绍所编的《中外策问大观》收录了“问中国政治上下古今载籍极博，今科举改章当以何书为宗得瞻经济，试筹议之”这条策问。彭世襄的一篇答卷，文章起首就说：“古者，学与政一而已矣，自政与教分，学即与政分。”而根据朱维铮先生的研究，在中国学术传统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乾嘉学者也早就有过区分“学”、“政”的努力。³⁶⁾如果说追溯普适性的“政治学”在本土学术脉络中的渊源，对“西政东渐”乃至“政治学”在中国之建立而言，是至为关键的一环的话，那么便有两条历史线索同时影响了这一过程：一是本土学术自身发展到晚清的逻辑结果，另一个则是国人为应对“西学”、“西政”所造成的文化紧张而做出的努力。

四 在本土打造普适性的“政治学”

追溯本土“政学”之源能从某种程度上缓解国人对“西政”的文化紧张。但是，本土知识分子发掘传统的目的并不止于此。

1896年梁启超上书张之洞，提议在中国建立政治学院。他向张之洞解释了他所理解的西方政治学：

其为学也，以公理（人与人相处所谓之公理）公法（国与国相交所谓之公法，实亦公理也）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焉而成者，则于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与夫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靡不融贯于胸中。³⁷⁾

接着，梁开始回顾本土的“政治学”系谱：

吾中国三代以前不必论，后此若汉之长沙，子政，武侯，秦之景略，后周之王朴，宋之荆公，夹漈，永嘉。元之贵与，明之姚江，国朝之梨洲，亭林，皆由此道。或当时行其所学而大效，或后世用其言而益大效……³⁸⁾

在此基础上，梁氏提出了如何融合中西传统，塑造一种适合在中国传授的新学科——“时务学”的具体方法：

以六经诸子为经（经学必从子学相辅，然后知六经之用，诸子亦皆欲以所学治天下者也。）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之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故时务一门，为诸学之

36) 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4页。

37) 梁启超：《上南皮张尚书》1896，见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104页。

38) 同上。

归宿，……且时务一门，无专门可以讲授，必事事推原经史……³⁹⁾

显然，梁氏重塑传统“政学”系谱乃着眼于融和中西，打造属于本土的“政治学”。

在梁启超为政治学堂设计的教学法中，子学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因为他认为在传统中“诸子是欲以所学治天下的人。”可以说，开设政治学堂，创立时务门，打造一种适合本土的“政治学”，是梁启超的主要动因。而适合在本土传授的“政治学”，自不能在传统中毫无渊源，于是，持中西政学同构观的梁启超，必然会致力于政治学之传统谱系的建构了。

梁启超除了上书张之洞之外，同时也向杭州知府林迪臣、陕西泾阳味经书院山长刘光贲（古愚）等人反复申述自己的主张，希望在浙中和关西能够同时推行建立政治学院。⁴⁰⁾

在写给林迪臣的信中梁启超提到，在中国的考据、词章、掌故诸学之中，掌故学最与西方合，易变法。所以新塑造的本土政治学，也有必要“参合”中国掌故之学：

中国旧学，考据、掌故、词章为三大宗。启超窃尝见侪辈之中，同一旧学也，其偏重于考据、词章者，则其变而维新也极难。其偏重于掌故者，则其变而维新也极易。盖其人既以掌故为学，必其素有治天下之心，于历代治乱兴亡沿革得失所以然之故。日往来于胸中，即遍思旧法，何者可以治今日之天下，何者不可以治今日之天下，抉择既熟，图穷匕见，乃幡然知泰西之法，确有可采。……故今日欲储人才，必以通习中国掌故之学。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⁴¹⁾

如何融合中西，塑造本土的政治之学，培养本土的政治人才，是梁启超当时关注的核心问题，为此还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方案。除了前述向张之洞提出的综合六经、诸子与西学的传授法外，梁氏还主张：

苟能以《周礼》、《公羊》、《孟子》、《管子》、《史记》、《文献通考》全史书志等，及近译西人政学略精之书数种，列为定课，使诸生日必读若干页，以今日新法证群书古义，而详论其变通之由与推行之道，其有议论，悉扎识于日课之中。而请通人评写之，或每月更设月课，其题多用策问体，常举政学之理法以叩之。俾启其心思，广其才识，则其所得亦庶几也，浙中此举为提倡实学之先声。⁴²⁾

1897年，梁复信陕西泾阳味经书院山长刘光贲（古愚），除重复上述看法外，始终强调“务使中学与西学不分为二，学者一身可以相兼”⁴³⁾

可以说，至十九世纪末戊戌政变前夜，梁启超之按西方学科的眼光重新梳理本土学术传统，乃出于提倡建立政治学院，培养本土政治专业人才及按西学样式打造适合本土的政治之学这类目的。但与此同时，

39) 同上。

40) 梁启超：《与林迪臣太守书》，《复刘古愚山长书》见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2页，第11页。

41) 梁启超：《与林迪臣太守书》，见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2页。

42) 同上。

43) 梁启超：《复刘古愚山长书》，见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11页。

一个较为清晰的政治学本土学术系谱，也就因此而渐渐呈现了出来。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就是学科的经典和人物系谱。

五 学科本土经典系谱的建立

1898年科举改重策论刺激了更多读书人从传统中梳理“政治典籍”。就“政治学”本土化而言，这是一个确立经典谱系的问题。在1903的《中外策问大观》中，此类策问屡见不鲜，如：

东西政艺之书，新旧译卷累千百，然其中有立说偏宕不合中国之情势者，有新说盛行旧说已成筌者，议论歧出折衷匪易。试为掇其英华，略其芜杂，分别部居论定大旨，为学人导其门径策。⁴⁴⁾

又如：

问中国政治上下古今载籍极博，今科举改章当以何书为宗得瞻经济，试筹议之。

彭世襄在其屡被选作范文的答卷中，清晰地勾勒了本土的“政学”典籍谱系：

……《易》、《诗》、《书》、《礼》、《乐》、《春秋》无一非教学之书。既无一非政治之书。不独《书》之典谟训诰，足以道政事也。随借汉儒撰述，依托圣言，而实可为古者学政不分之证。宋赵普亦谓“以半部论语定天下”。而《周礼》者，则尤体国经野之专政书也。……史学为后世经济所从出则以《御批通鉴辑览》为宗，而辅之以九通。近上海图书集成局，集股开印，取值颇廉，虽尚未成书，约一年可竣，此两书为政治之大观，即为经济学之根本。由是而读顾亭林《郡国利病书》，所以知风土也。由是而研求《大清律例》及《刑案汇览》两书，所以明律令也。由是而通考各国条约，购天津所刻《约章类纂》而究之，所以识外交也。取类不繁，而学四五年，其措诸行事，必有以异乎向者之迂疏矣。若夫爱博不专，而卒至于一无所用，或舍我中国所自有，而专以变革为宗旨，则非愚之所敢知者矣⁴⁵⁾

人们按“西方政治之学”重新塑造传统的结果是：《春秋》被定位成等同于西方公法、公理学的东西，《周礼》也被明确为一部政治学经典。如梁启超所说：

《春秋》一书，乃孔子经世大法，为万世公理、公法之祖。

《周礼》……要之，全书之中，其与今日西人政事相合者，不一而足，言致用之学者当知也。

梁启超的同门徐仁铸在湖南学政任上曾仿造张之洞《輶轩语》的体例，作《輶轩今语》，阐发南海师

44) 雷缙：《中外策问大观·学术卷二》，砚耕山庄，清光绪29年（1903）

45) 同上。

友们的一贯主张：“诸子之学多与西政西学相合”。对于经学的读法，他以今文学的立场，主张：

经学当求微言大义，勿为考据训诂所困。……西汉儒者《禹贡》行水，《春秋》折狱，《诗》当谏书，凡一切经济莫不出于经义。

故孟子以为天子之事，以期所言皆将为后王法也。亦如西人之果鲁西亚士虎哥等，以匹夫而创为公法学，万国遵之。盖《春秋》一书，实孔子所定之万国公法也……

盖《春秋》一书，实孔子所定之万世公法也……。西人政治家必事事推原于公理、公法之学，以为行政之本。今《春秋》者乃公理、公法之折衷也，学者必先通《春秋》，则可语之致用矣。新会梁启超著《春秋公法学》一书最可读。⁴⁶⁾

《左传》宜作史读，不必作经读。

《春秋》一书，乃孔子经世大法，为万世公理、公法之祖

梁和徐这样做的主观目的，主要是为了宣传老师康有为的相关理论，但是客观上，已经以西方政治学的学科眼光，重新定义了经典。

严复对《法意》所作的按语，还在中国传统中找到了与西人“劳士”、“西洋议院所议定颁行令申”相类的东西：“西人所谓法者，实兼中国之礼典。中国有礼刑之分，以谓礼防未然，刑罚已失……故如吾国《周礼》、《通典》及《大清会典》、《皇朝通典》诸书，正西人所谓劳士。……皇帝诏书，自秦称制，故中国上谕，与西国议院所议定颁行令申正同。所谓中央政府所立法也”。传统的《周礼》等书，一旦进入严复的政治学谱系，便也成了法律典籍。

实际上自“西政”东渐早期，传教士就曾经发掘过《管子》和《周礼》这两种经典。道光戊戌五月至七月（1838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介绍“英吉利”国政公会和“北亚默利加国政之会”时，就将大段出自管子的引文置于篇首。科举改试以后，例如“问管子之学理财养民二者孰优”这样的策问，更出现在各种策艺大全之中。人们从新的角度讨论和比较《管子》与《周礼》两部典籍，并得出如下这类结论：

《管子》一书，后世言富强者祖焉。其书所载，大抵不离《周礼》以制用。而亦不尽用于其法。今考其法，铸币籍以黄金刀布，而并及于鱼盐鍼鍈，六圜府之旧章也。他如五势三淮诸说，不过积弊藏羨，待之于官。然《周礼》言利，利在民，故养民重于理财。而理财即寓养民之法，《管子》言利，利在官，故理财重于养民，而养民亦理财之方。⁴⁷⁾

46) 徐仁铸：《轺轩今语》，见梁启超编：《中西学门径书七种》，上海：大同译书局石印本，1898年。

47) 雷绍：《中外策问大观·学术卷二》，砚耕山庄，清光绪29年（1903）。

汪家玉：《答〈问管子之学理财养民二者孰优〉》，载雷绍：《中外策问大观·学术卷二》，砚耕山庄，清光绪29年（1903）。

恰如学者所论，就中国学术自身的演进历程来看，清末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面临着如何继续的问题。原来盛极一时的考据学此时“已考无可考”，于是“由经学史学考证走到了诸子的考证，由诸子的考证走到研究诸子的学说思想”。⁴⁸⁾ 1905年刘师培作《周末学术史序》，自《国粹学报》第一期开始连载。刘氏认为：“近世臣儒，稍稍治诸子书，大抵甄明诂故掇拾丛残，乃诸子之考证学，而非诸子之义理学”。⁴⁹⁾ 而刘师培自己则有把握以这本《周末学术史》对诸子学“义主分析”。刘氏称自己此书与“前儒学案之例，稍有别矣”，将“以学为主”对“前人著作之体”有所变革。刘师培所说“以学为主”中的“学”，实际上就是西方社会学科。而他所以有把握说，能治前儒未治的“诸子义理学”，依靠的也就是西方日趋制度化的分科之学。

《周末学术史序》实际上是将诸子义理按照西方学科划归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兵学、教育学、理科学、哲学、术数学、文字学、工艺学、法律学等十五个科目，恰如今日所流行的做法，将思想史划分为“经济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等等。其中《政法学史序》力图以政治学的眼光来解析本土的诸子学，实则也为外来的“政治学”，提供了相当清晰的本土谱系。

按照刘师培的重新解读，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德礼为本，以政刑为末，视法律为至轻。其立说之初，非不欲破阶级之制度，惟囿于名分尊卑之说，不欲尽去其等差。”而墨家则“以众生平等为归……是墨子者，以君权为有限者也，较之儒家，其说进矣”；“道家立说，又与儒墨迥殊……而悉废上下之等差”。至于管子，则是“以法家而兼儒家……是管子以立宪为政，不以专制为政矣”，他与商鞅、韩非都是纯以法律为政治之本的。总之“墨家儒家之论政法，持世界主义者也。法家之论政法，持国家主义者也。道家之论政法，持个人主义者也。故立说各殊”。而秦始皇以后，“儒表法里”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相沿至今，这也就是中土长久以来的“隐忧”了。

在国粹派为“政治学”建构的本土经典谱系中，除诸子之作以外还有一部重要的典籍，那就是《周礼》。

清代学者虽然遍治群礼，却很少有专门致力于《周礼》研究的，其主要原因是自宋明以来对于《周礼》的争论从未停息。今文经学家更斥之为经刘歆篡改过的“伪经”。在孙诒让以古文家法治《周礼》之前，通行的注本只有东汉郑玄《周礼注》和唐代贾公彦《周礼注疏》。被梁启超誉为“死守正统派最后壁垒”之大师的孙诒让，穷二十余年之功，于1899年正式完成《周礼正义》八十六卷。两年以后，又在此基础上作《周礼政要》二卷。《周礼正义》与《周礼政要》一则治经之学，一则-是治世之言。二书体用相辅，是清代经典注疏中的重要压卷之作。⁵⁰⁾

孙诒让在《周礼政要》中试图阐释周礼的“义理”，借助的仍然是自己理解中的“西政之学”。《周礼政要》力证“西政暗合《周礼》”，所谓：

周礼一经，政法之精详与今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则华盛顿、拿破仑、卢梭、斯密亚丹之伦所经营而讲贯今人所指为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前之旧政已发其端，吾政教不修，失其故步，而缙

48)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49) 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序言，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李妙根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11页。

50) 参见周予同：《群经概论·本论四 三礼——周礼、仪礼与礼记》，载周予同著，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0页。

绅先生咸茫昧而莫知其原亦缀学者之耻也⁵¹⁾

孙诒让在书中把周代三询之法与近代议院制，周代三刺之制与陪审制度，周代司布之官与商部，周代的国学、效学、乡遂之学与近代大中小学进行比照，认为都有相合之处，据此提出西政与“圣人之道”相符。

显然，传统学术发展到孙诒让的时代，不借助于新的理论体系，已无法在“义理”阐释上有所突破了。而“西政之学”来自于一个全新的知识体系和理论背景，恰能被孙诒让等借用，以丰富传统的“《周礼》研究”，并阐发自己对于现实政治的见解。同样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孙氏的上述努力也从客观上将《周礼》纳入了正在塑型中的“本土政治学”学术谱系中。陆绍明发表于《国粹学报》第十八期的《古代政书史总序》一文，即声称：“《周礼》一书，人仅知其为政治之书而未知周礼六官为政治之谱（书分六官，谱之体也）”，就更明显地着眼于此了。

国粹派学者以“西方政治学”来复兴诸子学，丰富对《周礼》的研究，然而他们所理解的“西方政治学”，仍然不是严复所谓“即物穷理”的政治学。马叙伦从疆域志、图谱志、学术志、教育志、兵志、刑志、职官志、食货志、庠序志、艺术志、四裔志、天文志、博物志、乐志、征榷志等十六个方面来讨论所谓“古政”。孙诒让《周礼政要》内列“教胄、广学、通艺（算学 光重化电）、选举（荐举 征辟）、广报（报馆）、通译（译书）、观新（凭单 博物院 博览会）、治兵（民兵）、巡查（警察）、图表、会计（豫算 决算）”等目。都可以看出，“国粹派”学者观念中的“政治学”，仍然和戊戌前梁启超所认识的一样，主要包括了一些具体行政之术及议会、民权等西方政治理念，并未脱张之洞所定的“西政”范围。因此，“国粹派”学者对“政治学”传统谱系的定位及塑造也就必然是建立在上述认识之上的。

“西政”东渐刺激本土追溯自身的“政学”传统，其最基本的环节就是对本土“政学”经典系谱的清理，科举改试策论给这一过程更添上了些许实用性的色彩。从做策论的士子到奔走倡议建立政治学院的维新变法者梁启超；从“讲西学之第一人”的严复到欲以西学治“诸子义理之学”的刘师培，抑或“死守正统派最后壁垒”的孙诒让，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背景各异的中国知识分子出于不同的动机，在中国传统中梳理出一个清晰的“政学”经典系谱。这其中，《春秋》、《管子》、《周礼》、《九通》、《郡国利病书》等取得了重要的地位。西来“政治学”也因为能扎根传统，而取得了解释上的普适性，它现在可以同样去解释中国本土的政治内容了。

六 学科本土人物系谱的成型

经典的重新定位必然会涉及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对于塑造本土政治学的过程而言，重新编定属于本土“政治学”的人物谱系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首先取得“大政治家”美誉的是王安石。1908年，梁启超为王安石作传称：

……荆公不仅为中国大政治家，亦为中国大文学家，故于其诗文采录颇多其散见于前各章者，皆与政治有

51) 孙诒让：《周礼政要》，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四辑》第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

关系者也

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

晚清以降，随着经世实学兴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一系列学术及社会变革的发展，人们对王安石的褒贬评价渐趋升温。梁启超此处的溢美之词，自然符合其作为一个变法者一贯的言论逻辑。然而断然地将王安石定位为“大政治家”，从政治学学科人物谱系的建立来看，却无疑更是十分重要的了。

在梁启超的政治学传统人物系谱中，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人物是先秦时代的管仲。1910年梁启超作《管子传》，⁵²⁾将管仲与孟德斯鸠、卢梭、马格亚比里、霍布斯相比较，认为管仲的学说与他们“若合符契”，而且不仅比他们立说更早且又立论更为“中正”。梁启超声称，管子是能数千年前就发明主权在国家之说的人，相似的理论在泰西很晚才出现。除此之外，管子还是最早发明“法治主义，以成一家言”的人，据此他宣布：

其以伟大之政治家而兼为伟大之政治学者，求诸吾国，得两人焉：于后则有王荆公，于前则有管子。……而政治学者之管子，其博大非荆公所能及；政治家之管子，其成功亦非荆公所能及。故管子偶乎远矣。

管子以后，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其人物谱系是这样的：

……自管子而后，以政治家闻者，若郑之子产，若秦之商君，若汉之诸葛武侯，若宋之荆公，若明之张江陵，若近世之胡文忠何非有得于法家者言？……

接着，梁启超详细论述了管仲的政治思想，他认为“管子政术，以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

梁著《管子传》，对管仲思想还进行了具体分目：“……管子之法治主义、管子之官僚政治、管子之官制、管子内政之条目、管子之教育、管子之经济政策（国民经济之观念、奖励生产之政策、均节消费之政策、调剂分配之政策、财政策、国际经济政策）、管子之外交、管子之军政”。梁启超是完全从自己所理解的西方政治学分类模式出发，来重新解析管子思想的。就这样，管仲的理论按照当时人们理解的“西方政治学”，被分割成八个方面，数十款细目来加以解读。相应地，管子便成了新打造的中国政治学传统系谱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1902年杜士珍发表《论秦后政治家派》，也着眼于从本土学术传统中去塑造“政治思想史”，建立政治思想人物谱系。他认为儒家之学远承文王的《易》与周公的《礼》，孔子兼采这两部经典“而为政治学之一归宿”。孔门七十子传其学于列国，到了战国时代分裂为孟子与荀子二大派。孟子与荀子的区别主要有八项：孟子主大同，荀子主小康；孟子得力于《诗》《春秋》，荀子得力于《礼》；孟子伸民，荀子尊君；孟子平贵贱，荀子崇上下；孟子抑权力，荀子悬名分；孟子力避上下之防，荀子曰君臣不得不尊；孟子言

52) 梁启超：《管子传》（191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专集第二十八。

道，荀子言法；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秦汉以后在政治思想上属于孟子一派的有：贾谊、司马迁、董仲舒、盖宽饶、陶渊明、陆敬輿、范仲淹、司马迁、郑渔仲、陆象山、王阳明、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属于荀子一派的是：晁错、诸葛孔明、王猛、周绰、杜佑、王安石和张居正。⁵³⁾

就《新世界学报》的撰稿人所塑造的古代政治学谱系而言，其内容及观点并没有什么独到之处，显是继承了此前维新派“扬孟抑荀”的一贯做法及康梁对于“孟、荀”的基本定位。⁵⁴⁾然而，杜士珍宣布孟、荀是“政治家派”，归于“政治学”一栏加以讨论，其立意要为中国政治学建立一个学术谱系，却是甚为明朗的。

以杜士珍为代表的《新世界学报》撰稿人，出于与西方列强“竞学”的目的，按照自己对政治学的理解，严格从西方日趋制度化的社会学科模式出发，重新塑造传统与建立所谓政治思想史谱系，显然已经将普适性的“政治学”对传统的“学理收拾”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至此我们考察了“政治学”本土历史记忆建立的若干环节。“西方政治之学”与中国本土传统的互动，始终是“政治学”本土学科谱系形成的重要背景。它发生于晚清学术转型的历史背景之下，其动因也就相应显得较为错综复杂。早期基督教传教士比附中西，是为了在本土学术体系下暗渡陈仓，以实现宣传教义的目的。中国自身更为精致的理论“西学中源说”，强调“西学、西政”全然发源于中土。由于中国自身传统中道断绝，“畴人弟子抱器西去”，方于西方“肃杀阴惨”之地发展成今日的西方政学。在本土学术势强阶段，“西学中源说”为政见截然相左的洋务派与保守派同时提供了理论支持。可以说，“西学中源说”就理论而言，比之新教传教士要远为精致。并且在这最初的两个阶段中，人们的主观目的各不相同。新教传教士比附中西学问，是为了令他们的教义更易为人所理解与接受。而中国士人则要证明所有的西学及政治理论全部是出自中国传统的，倡导或反对之的理由也都建基于此。但是，这两个阶段仍然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共通之处：首先，人们都在本土学问模式内进行着比附，基本上没有触及传统的知识分类法。其次，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从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子学”中寻找一些资源。虽然这个阶段，大家的出发点都尚不在于以西方政治学的学理去重新诠释及规范中国传统，但是就日后中国政治学传统系谱的建立而言，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无疑已经奠定了。戊戌前夕，西方社会学科及其相关理论其势转强，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严格按照西方“政治学”理论及叙事模式重新梳理和解释传统。康梁维新派除了欲依此打造适合本土传播的“政治学”新学科外，其旨在继续控制经“政治学”改造后的传统，掌握论证现行制度合法性的资源，其意图也颇为明显。严复虽然否认中国传统中存在西方式“即物穷理”的“政治学”，但是仍然在本土资源中寻找与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相对应的内容，他甚至首次将中国传统分封意义上的封建论，与西方封建时代等同起来，并把宗法社会看作封建时代的产物。⁵⁵⁾《新世界学报》在传统中溯“政治思想”之源，

53) 杜士珍：《论秦后政治家派》，见《新世界学报》壬寅第二期 政治学 1902年9月16日。

54) 按，维新派有“排荀运动”与王先谦、叶德辉的“尊荀”相对立，旨在尊孟抑荀。康有认为孟子传“大同”，而荀子则传“小康”。梁启超把荀学概括为“尊君权”、“排异说”、“谨礼仪”和“重考据”，而把孟学与旨在扩大乡绅权力的“倡民权”联系起来。参见朱维铮，《晚清汉学“排荀”与“尊荀”》，见氏著《求索真文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55) 参见赵利栋：《近代中国的封建与封建主义》，见《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02期。

乃激于与西方列强“竞学”的外部压力，欲建立具有“世界学”资格的本土政治学。与《新世界学报》同人颇有学术渊源的“国粹派”知识分子，则出于本土学术求新求变的内部需求，以“西方政治之学”为治诸子或《周礼》义理学的新手段。这其中传统诸子学与外来的西学也存在着类似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自基督教传教士到国粹派，不约而同都从先秦诸子资源中求取与西学对应的内容。另一方面，诸子学在晚清学术转型中渐渐走至研究前台，便也从西学西政的理论及叙事方式中，寻求着突破自身所谓“义理”研究的新方式。

正是出于上述形形色色的复杂动因，西方政治之学与中国本土尚处于发展变化中的学术传统，不断地发生着互动。到二十世纪初年，西方日趋制度化的社会学科“政治学”就在上述互动中建立了自己的本土学术谱系。而“中国政治学”的塑造，无疑正是建基于此。

